

簡吉與外來團體的關係

張獻堂*

摘要

台灣農民組合最初成立之時，本是一個單純以提高農民智識與文化的團體，可是後來卻一步一步走向激烈抗爭的「左派」路線，這實與農民組合與其他外來團體的密切接觸有關。由於農組本身人才與經費的缺乏，再加上社會運動經驗不足，就必須積極於尋求外來團體的奧援。可是從另一面向來看，台灣農民組合是當時最大的社會運動團體，是其他結社組織所亟欲爭取合作的對象，面對日本這個外來統治政權，它是共同敵人，於是互為聲援、相互合作是十分自然的事。

在這相互合作的過程中，台灣農民組合的領袖—簡吉，是最具關鍵性的角色。台灣農組成立後，簡吉和趙港親赴日本國會請願，期間並和日本農民組合和勞動農民黨接觸，所以在農組成立之初，日本方面先後派了麻生久、布施辰治和古屋貞雄來台，簡吉也將日本的思想、戰術移植到台灣，增加了「階級鬥爭」的色彩。

台灣農組在第一次全島大會後已是島內最大團體，且有「左傾」的傾向。1928年台灣共產黨的謝雪紅被押解回台，被釋放後積極攏絡農組，而謝雪紅第一個想吸收的人便是簡吉，這是因簡吉在農組的地位與農民的心中，聲望是極高的，如此想要拉攏農民組合也相對容易些。此時的農組在各地抗爭激烈，極需人才與經費，簡吉就和台共的謝雪紅合作，最後更加入了台灣共產黨，簡吉的思想更為左傾，更帶有濃厚的共產主義。

簡吉的共產主義色彩，也為他帶來了坎坷的命運。台灣總督府就以農組進行共產主義運動為由，於1929年2月12日進行全島大檢舉，簡吉因此被逮捕，判刑一年。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學碩士班畢業

關鍵字：簡吉 台灣農民組合 勞動農民黨 台灣共產黨

壹、前言

台灣社會長久以來就在外來統治之下受到殖民地與封建的雙重剝削，台灣農民往往成為反殖民、反封建的引線。1920 年以後，留學生等知識份子下鄉與農民大眾相結合，農民運動就在民族自決的倡議下，受到思想啓蒙而展開反對運動。後來農民大眾更受到民族運動與階級鬥爭的薰陶，漸為台灣共產黨所影響，台灣農民組合身處此潮流當中，終成為台共的外圍組織。

整個台灣農組的發展過程中，農民運動實與其他結社團體脫不了關係。但兩者關係常被誤解，因「農民爭議訴求的主題與抗日民族運動的政治訴求完全沒有契合之處，農民運動的面貌之所以遭到扭曲，是受到政治團體介入參與，並在各政治團體的內部綱領中標榜對農民運動策略與運作，渲染自身團體在民族運動中的領導地位所致。」¹ 或甚至有學者認為「農民運動只是民族運動及階級運動的工具」，² 可是就《台灣民族運動史》的觀點，簡吉的個人思想，在初期乃是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而且領導農民抗爭的主要目的是爭取經濟條件之改善，與政治改革並無明顯交集。³

但是處於殖民地地位的台灣，不僅僅有著日本的異族統治，受種種不平等的對待，還有日本財閥和本地與日本財閥結合的大地主的剝削，所以不僅有民族主義的色彩在內，階級意識的因素也極為濃厚。當時的農民運動與一般社會運動類似，除了爭取自由與生存權利外，還蘊含著複雜的民族情結在內，不但是一種社會經濟運動，也是一種民族意識的運動，⁴ 更是排日反日的一種運動。所以不管基於民族情感上或經濟上，他們有共同的敵人，因此「各結社團體互為聲援，相互合作，是十分自然的，此充分反映了當時社會運動份子的角色十分複雜，常橫跨數個結社團體。因此台灣農民組合與各結社

¹羅文國，《日本殖民政策與台灣農民運動的形成（1895-193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年，頁 148。

²王鳳雄，《日據時期台灣社會解放運動及論述》，私立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頁 133。

³陳翠蓮，〈菁英與群眾：文協、農組與台灣農民運動之關係（1923-1929）〉，收錄於陳慈玉主編的《地方菁英與台灣農民運動》，2008 年，頁 110。

⁴江亮演，〈日據時代臺灣農民與勞工的社會運動〉，《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5 期，1997 年，頁 127。

團體的關係，絕不能以純粹工具說來看待。」⁵

當時的台灣社會，交雜著爭取生存權利的經濟利權運動和台灣民族意識的運動，再加上當時共產主義的盛行，使得各個結社團體雖互相競爭，但也互為奧援。當時的台灣農民組合，即受到外來團體的合作與支援而聲勢達於高峰，卻也因外來團體的介入，而快速走向敗亡，這是歷史潮流的因素，絕非少數幾個人所能影響的。

貳、簡吉與日本勞農黨的接觸

日本勞動農民黨對台灣農民組合的草創時期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它是 1920 年代左翼運動的政黨之一，台灣農民組合與日本勞農黨的首次接觸是從二林事件開始的。1926 年（大正 15 年）、1927 年（昭和 2 年）勞農黨幹部麻生久、布施辰治受文化協會之請，來台分別為二林事件一、二審辯護。

為替二林事件辯護，麻生久於 1926 年（大正 15 年）7 月 20 日來到台灣，辯護結束後，麻生久接受農組幹部簡吉、趙港的安排，赴中南部的農村視察訪問，召開農民演講會。麻生久 7 月 24 日自台中出發，隔天，抵達嘉義竹崎庄，受到林龍等百餘位農民熱烈歡迎，並在大廟前，以「農民生活之向上」為題，引述日本農民運動與台灣農民生活的現狀，認為農民在社會所做的事業是最重要的，但農民卻處於最壞的地位。近來農民漸知曉此道理，所以非團結不可，基於共通的感情，興起組織農民組合，以圖自己生活之向上。⁶在此演講中，宣揚了階級鬥爭的必要，並呼籲農民團結抗衡地主資本家，推動成立農民組合。⁷然後繼續到曾文郡，接著到簡吉的老家鳳山，最後接受趙港等幹部的邀請到台中大肚，每到一處都受到農民熱烈的歡迎，演講題目大致相同。藉著這次的巡迴演講，麻生久宣揚社會主義，並喚起農民的覺醒與團結，他使農民了解到必須成立農民組合，才能維護自身權益，爭取到合理、公道的對待。

1927 年（昭和 2 年），2 月 17 日簡吉與趙港因土地放領與竹林爭議等問題，向日本帝國議會請願。在日本其間，曾赴大阪出席日本農民運動組合第六次總會，會見了幾位日本社會運動健將，包括日本

⁵楊光華，《日據時期台灣農民組合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頁 94。

⁶《台灣民報》第 119 號，1926 年 8 月 22 日，頁 8。

⁷《台灣民報》第 119 號，1926 年 8 月 22 日，頁 8。

九州農民組合聯合會會長花田重郎，並與之對話：

花田：我們想請教遠道而來的台灣農民組合的同志關於彼地的情況。

簡吉：(台灣)我等如何被壓榨不用多說。甚至日本政府給予我們的登記權最後也遭到資本家侵害。在台灣，條件最惡劣的是甘蔗，他們支付給我們三千萬元款項，卻以四億八千萬以上的價錢販售。各位看，如此可惡至極的壓榨。像香蕉也被課予種種的賦稅。還有，以做為優惠退職官吏之用為名義，奪取我們的土地。如果要我等離開那些土地，我們寧願死在那塊土地上。⁸

之後又於2月25日抵達東京，經由台灣文化協會的安排，簡吉有緣結識了日本勞動農民黨的布施辰治律師與古屋貞雄。布施辰治與簡吉交談後，頗同仇敵愾，決定撥空到台灣替二林事件被判刑的台灣人辯護，為台灣工農爭取權益。簡吉回台後，因擔心布施辰治來台的安全，所以寫了一封信警告他，簡吉寫說：

您承諾為台灣的二林農民事件上訴審判擔任首席律師，我異常高興。抵台之後，請您不僅出席法庭審判的辯護，也請作全島巡迴演講，俾推進台灣人解放運動。為使萬事能順利進行，我已經和台灣文化協會與其他單位聯絡。先前拜見您曾提醒，來台灣的話，多數日本人(異議人士)都會被殺害，所以為了避免被殺，請您要有覺悟。當時面談之際，您似乎沒理解我說的話，若加以解釋，就是說，幾乎所有日本社會運動家渡台以後，他們原本要抵抗台灣總督府的鬥爭精神，後來都一一被扼殺消失！總督府會讓這些日本人覺得殖民政府到底還是很通情達理，而且會給予很好的招待。他們反過來卻會亮出彈壓言論的殺手鐮，來扼殺社會運動家的鬥爭精神。對於這一點，務請注意，以回應台灣人的期待。⁹

為回應台灣人的期待，布施辰治在來台不到十天，225個小時當中，就造訪了台灣南北21個地方，

⁸蔡石山，《滄桑十年：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 1924-1934》，台北：遠流，2012年，頁130。

⁹蔡石山，《滄桑十年：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 1924-1934》，頁122-123。轉引自布施辰治著，《布施辰治—自幸德事件至松川事件》，東京：未來社刊，頁36。

作了三十次演講，¹⁰對台灣農民運動的付出可說殫精竭慮，精神令人敬佩。而台灣人也給予熱烈的回應，在他三十場演講當中，場場爆滿。在他台中演講前的文宣上寫著：「我們親熱的無產階級前衛，遠自日本之地的布施辰治，這回為著同胞所提心吊膽的二林蔗農做爭議的辯護」，在彰化的演講文宣則說：「布施辰治是日本勞動界的泰斗，是無產勞動階級唯一的辯護士。」¹¹布施辰治每至一處演講，民眾總是人山人海，給予熱誠的歡迎。

布施辰治的每場演講，都是用日語，所以再經由簡吉以台灣話口譯，由於演講以一個半小時為限，時間非常緊迫。他的演說內容除了為二林事件被判刑的台灣人叫屈，還指控殖民政府的苛酷法律，批判日本中央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令一般大眾感到痛苦。所以他呼籲台灣民眾要團結一致，與資本家、統治階級對抗。布施辰治的每場演講，透過簡吉的翻譯，是如此地振奮人心，所以對農民覺醒的震撼力非常之大。

簡吉自日本請願歸來後，農組活動更加積極，農民組合展開了全島總攻擊，組織宣傳隊，於各地不斷舉辦巡迴演講，可是卻受到殖民政府的迫害、鎮壓，組合員被毆打、拘留、處以罰金，幹部被隨意地羈押逮捕，事務所被搜索，文件被扣押。簡吉所領導的農組深受挫折，他認為如果農民運動要繼續發展的話，需日本朋友的大力協助，於是他又寫了信給日本的花田重郎，提到由於台灣農組缺乏律師，所以只要遇到爭議就感到非常辛苦，所以在中常委會議中決定，向勞農黨提出請派一位律師來台。

日本勞農黨很快答應台灣農組的要求，派了古屋貞雄律師來台支援。古屋貞雄律師 1927 年（昭和二年）5 月 4 日第一次來到台灣，此次來台 20 天，到 25 個地方演講，由簡吉擔任通譯。古屋這次來台，主要是解決農業糾紛的法律問題，並在各地舉辦巡迴演講，激發農民階級從事解放抗爭的熱情。在台其間曾要求日本當局放棄一貫的榨取政策，於是向台灣總督府提出陳情書：

台灣總督府的土地政策是無視緣故者與耕作者，徒使土地買辦階級簇出，而惹農村的紛爭。又在產業政策，也是對生產物的管理權行不當的干涉，方便中間買辦階級擅行榨取，以致極度威脅到農民的生活。因此要盡速廢止這些政策及不當的干涉，尊重本島古有的土地慣習以及生產

¹⁰謝四海，〈二林蔗農事件的時代背景與對臺灣農運的影響〉，《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第 107 期，2010 年，頁 48。

¹¹蔡石山，《滄桑十年：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 1924-1934》，頁 123。

者的生產物管理權，使土地緣故者或耕作人能得安心精進於農業，俾得多額生產，以期保障農民生活……。¹²

古屋回到日本後，這份陳情書也影響了日本勞農黨與日本農民組合，於是針對退職官土地放領問題，兩個團體一起發表了〈對首相與台灣總督之抗議書〉，¹³其精神與內容幾乎是古屋陳情書的翻版。它直指了台灣總督府的退職官土地放領政策是極其不當的做法，完全不顧農民生計，使農民生活備感威脅，這將造成台灣統治上的重大問題，希望上位者能保持農村安定，保障農民的生活。

由此可看到，簡吉、趙港的東京請願之行，使得台灣農組與日本左翼團體的關係更加密切了，而派古屋針雄律師常駐台中，擔任台灣農組的顧問，也擔保了台灣農組今後與勞動農民黨的聯繫。¹⁴古屋擔任顧問期間，不遺餘力地將日本勞動農民黨的思想、組織宣傳技術以及鬥爭經驗傳授予台灣農組，這使得台灣的農民運動日漸傾向社會主義，也感染到了階級鬥爭的色彩，這可從 1927 年（昭和 2 年）12 月台灣農組的第一次全島大會重要決議與當時農組文宣上的主張、戰術與口號可看出。¹⁵並透過古屋的協助，台灣農組與朝鮮左翼團體搭上了線，所以在台灣農組的第一次全島大會日本與朝鮮的許多左翼團體均有與會或祝電，聲勢之大可謂空前。

二林事件使得台灣農民運動與日本勞動農民黨有了初步的接觸，而為了要與殖民政府抗爭，台灣農民畢竟經驗不足，不能單靠自己的力量，必須學習其他地方農民運動經驗與理論，且台灣農民生活貧困，缺乏知識，為了生活沒有機會讀書學習，只有藉著如簡吉等這樣的少數知識份子，才能眼界大開，展開更進一步左翼的社會運動道路。簡吉與趙港的東京請願之行，就與日本的勞動農民黨建立了更緊密的關係，農組與日本勞農黨的合作，形成了「台灣民族解放的實現與日本無產階級的緊密結合」，¹⁶彼此互相支援，以達成目標。所以簡吉、趙港也在日本學習到不少新的鬥爭方法，更由於日本勞農黨的支持，讓台灣農民組合的活動更加蓬勃發展，不再如以前被動式的請願，而是採取更激烈的

¹²《台灣民報》第 160 號，1927 年 6 月 5 日，頁 6。

¹³參考連溫卿著，張炎憲、翁佳音編校，《臺灣政治運動史》，台北縣板橋市：稻鄉，1998 年，頁 174。

¹⁴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 年，頁 45。

¹⁵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6 年，頁 76-85。

¹⁶《台灣大眾時報》第 3 號，1928 年 5 月 18 日，頁 11。

示威遊行活動，這也讓 1927 年到 1928 年的農民運動達到最高峰。可是隨著台灣共產黨在農民組合內部的滲透，影響力也逐步擴大，日本勞農黨在台灣農民組合的指導者角色，便逐漸被台灣共產黨所取代。

參、簡吉與台共的接觸

農組成立初期，由於受到日本農民組合和勞動農民黨的協助和支持，台灣農民組合迅速的發展。農民組合於是採取了日本的行動模式，不再被動的請願，除了鼓動農民大眾示威外，也採取了更激進的行動，台灣農組於是逐漸與狹義的民族主義運動分道揚鑣，從此和階級鬥爭緊密結合在一起。¹⁷1927 年底，台灣農組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宣布自己將「馬克思主義化」，依照馬克斯指導無產階級的方法，成為解決農民問題的方針。就在日本本國共產主義的影響與指導下，農民很快的自覺起來，於是農民抗爭迭起，農民組合的會員人數與支部迅速增加，成為全台最大的社運團體。看到農組規模如此之大，台共認為「農民組合實際上已成為台灣革命運動中戰鬥的、最大而且最鞏固的大眾組織」。¹⁸此時正是台灣共產黨的草創階段，如何積極滲透進入領導農民運動的台灣農民組合，被視為台灣共產黨發展的一個極重要工作，尤其當時的知識份子，「到民間去」、「到農村去」的呼聲極為高漲，只要稍具抗日意識的青年都自然而然想到與農民合作，自日本回台的留學生，更覺察到農民是站在反抗台灣總督的第一線，於是紛紛加入農民運動，¹⁹再加上當時台灣農組在第一次全島大會中，路線宣布朝向「馬克思主義化」，更為台灣共產黨滲透入台灣農民組合提供了絕佳的機會。因此台灣共產黨選擇與當時蓬勃發展的台灣農民組合合作，是自有其客觀條件的。

台灣共產黨在建黨大會後提出了「農民問題的重要性」，明確指出台灣農民運動已統合在台灣農民組合之下，這的確給台共在農民運動上提供最佳的前提條件，不過台共組織認為台灣農組在思想或實踐方面犯了種種錯誤，包括：

- 1、農民組合把農民誤認為是無產階級與台灣革命的主力軍，根本上忽略了無產階級的作用。

¹⁷陳逢源，《台灣經濟と農業問題》，台北：萬出版社，1944 年，頁 38。

¹⁸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農民運動〉，頁 133。

¹⁹陳芳明，《謝雪紅評傳》，台北：麥田出版，2009 年，頁 72-73。

- 2、農民組合因成為農民運動的指導體，把大眾團體的農民組合與政黨混同了。
- 3、由於受到日本福本主義的不良影響，不但不瞭解農民的實際需求，且竟然否認民族革命運動，只顧高唱階級鬥爭。
- 4、輕視群眾的日常鬥爭，幹部只熱中於政治活動，使得農民趨向於獨立的形勢。
- 5、對工農的革命同盟未曾有過具體作為。
- 6、農民的基本訴求是土地問題，但對於封建地主與帝國主義的反對運動卻未曾明確提出。²⁰

為克服這種種錯誤和充分利用農組所創造出來的有利形勢，台共決定派遣黨員加入台灣島內各運動團體，以擴大台共在其中的掌控力道。所以台共在建黨初期的目標是：

當前的緊急任務是儘速吸收散佈在台灣各地實際參與運動的共產主義者，以這些革命的先進知識份子為中心，首先著手準備組織的召集。在準備會議之後，努力吸收從事戰鬥員之勞動者與農民黨員，然後，才能以勞動階級和貧農為基礎，開始建立一個嚴密堅固的共產黨。²¹

這些運動團體其中包含了農民組合在內，而謝雪紅在其間擔任了重要角色。1928年(昭和3年)5月謝雪紅被日本政府從上海押回台灣，許多人從報紙得知這個消息，6月在台中被釋放後，當時簡吉等一些社會運動人士曾找過她，並向她介紹農民運動的情形，並聽取他的意見。謝雪紅並認為簡吉等人是因她高舉著無產階級革命的旗幟，所以願意接受台共的領導與無產階級革命的。²²

此時謝雪紅也想在台灣發展共產主義革命，工農群眾向來是共產黨發展方向，但她並無群眾基礎，最佳的捷徑，就是從農民組合與文化協會開始。當時的台灣農民組合本部和台灣文化協會本部都設於台中大屯，為了便於接觸，謝雪紅也在台中公園附近租了房子，趁此到這兩個運動總部拜訪，農組與文協的許多幹部也相繼造訪她，特別是農組的人，所以謝雪紅在她的《我的半生記》中提到：當

²⁰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共產主義運動〉，頁61；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台北：草根文化出版社，1998年，頁655。

²¹若林正文，《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台北：播種者，2007年，頁325。

²²謝雪紅，《我的半生記》，台北：楊翠華，1997年，頁273。

時正是農民運動最高潮也是最活躍的時期，但因缺少幹部不能應付形式發展的需要，簡吉、趙港同我談起這個問題，並提議辦一個青年幹部訓練班的計畫，我即刻表示贊成，並願意積極支持他們。²³

爲了能讓台灣共產黨在台灣島內發展、奠基，謝雪紅第一個想要吸收的黨員便是簡吉，因爲簡吉是當時農民組合中聲望最高也是最有影響力的人。根據台共的一份重要文件〈農民問題對策〉顯示，要發展台灣共產黨就必須與島內的農民運動建立密切聯繫，內容就指出：

- 一、要強化農民組合的思想武裝，須發行全島性的機關刊物。一方面爭取言論自由，一方面對農民大眾展開思想訓練。
- 二、台共的活動與農民運動，是台灣民族的共同鬥爭，同樣都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也要廢除反動地主與其他一切封建的殘餘。
- 三、土地問題是當前農民大眾奮鬥的目標，也是台灣民族民主革命的社會內容。所以，提出『土地還給人民』、『土地公有化』的要求，是正確的。
- 四、台灣革命的指導權，應屬工人階級。就台灣各階級勢力與階級結構來看，勞動者才是台灣革命的指導權。因此革命指導權並不在農民手中。不過，農民是台灣革命獨一無二的同盟軍。」。²⁴

從這一個文件我們可以看出，謝雪紅只是把簡吉和他的農民組合視爲同盟者，並非革命主力，它只是謝雪紅發展台灣革命的過渡階段。

1928年(昭和3年)7月，簡吉和謝雪紅合作，在農組本部開辦「青年幹部訓練班」，學員是從農組支部的積極青年中調過來，擔任講師的有簡吉、楊克培與謝雪紅等，簡吉主要講授的主題是「農民運動的問題」。課程雖由農民問題開始，但在謝雪紅的影響下，課程卻逐漸轉向了國際共產主義的運動和殖民政策的批判。在9月23日至11月8日在農組本部樓上也組成了一個「社會科學研究部」，講員與指導員包括了簡吉、陳德興、楊克培與謝雪紅等人，研究主題包括台灣農民運動、共產主義與無

²³謝雪紅，《我的半生記》，頁273。

²⁴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臺灣史觀》，台北：麥田出版，2011年，頁430。轉引自山邊健太郎編，《台灣》（現代史資料二十二），山邊健太郎編，《台灣》（現代史資料二十二），東京：みすず書房，1971年。

產階級運動等問題。

另外就在農組在各地爭議的發展逐漸增溫之時，發生了經費困難的問題，爲了爭取廣大民眾的同情來支援爭議和解決財政困窘，簡吉找上了謝雪紅來協助募款，²⁵這是因爲當時謝雪紅擁有高知名度，透過她的拜訪，農組的人再去募款相對容易些。

就這樣，農組因爲人才與經費問題，和謝雪紅的關係愈來愈緊密。透過謝雪紅介紹，農組許多幹部，如簡吉、趙港、楊春松、楊克培、簡娥、葉陶……等人紛紛加入台灣共產黨。其實簡吉會加入台灣共產黨早已有跡可循，根據黃師樵的描述：「簡吉在高雄第三公學校勤務時，頗愛研究列寧及孫文所著之學說，抱持左傾思想」、「自日本訴願歸台後，為農民組合之擴大強化，至各地辦演講會，宣傳階級意識」，而簡吉在結識謝雪紅與楊克培後，簡吉的思想更加左傾化，遂帶有濃厚的共產主義色彩。²⁶所以簡吉就在 1928 年(昭和 3 年)年底，台灣農民組合第二次大會上，與謝雪紅、林兌等合作，提出台共的「農民問題對策」之提案，其目的就是要將台灣農民組合完全置於台灣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將農民組合轉化爲赤色組織。簡吉也因此「二一二事件」中入獄，但出獄後，依然不爲所屈，繼續推動農組的赤化。

其實農組要不要支援台灣共產黨，簡吉也曾深思熟慮過，態度是冷靜且理性的。在 1928 年九月底，簡吉、陳德興、楊春松、楊克培等幹部就曾密會於農組本部樓上，討論是否贊成謝雪紅所提議的支持共產黨的問題，簡吉展現出他的絕對理性，決定如此的回應：「於現實情況，連幹部都有許多人不知道黨是什麼，而我們也正在研究。另一方面，現在的農組幹部裡有農組方針相反的楊貴一派的反動勢力的餘黨。排除他們是當前急務，另外鑒於現在農組的合法活動都受到如此彈壓時，即刻接受黨的提議一事需要多加考慮」，所以簡吉雖然支持共產黨，本身也加入台共，但對於處理台共與農組的關係，卻不失於理性判斷。

不過就在台共的介入下，台灣農民組合本身產生了根本上的質變。它造成了農組內傾向台共的幹部派與非幹部派的對立與分化，以簡吉爲首的幹部派聯合謝雪紅排除了楊貴等的非幹部派，非幹部派

²⁵謝雪紅，《我的半生記》，頁 275。

²⁶黃師樵，《台灣共產黨祕史—台灣史上的第一面紅旗》，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 年，頁 39。

被排除後，農組的台共色彩更加濃厚了。

1928年(昭和3年)12月30日台灣農組在台中市初音町的樂舞台召開第二次全島大會，除了依照「農民問題對策」的指導進行討論，將「土地還給人民」的口號優先提出，工農加緊聯盟，更強調要將農民運動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聯繫起來；²⁷也選出了中央委員，在這次當選的委員中大部分是台共或親台共的成員，簡吉也在這次選舉中雀屏中選。台灣農民組合至此完全落入了台共的控制之下。

這次農組的大會在台共的指導下成果豐碩，大會結束後所發表的口號與宣言皆與「農民問題對策」相互配合，包括「農民生存的耕作權之確立」、「生產物管理權之確立及小作料減免」、「擁護工農祖國蘇維埃」、「全世界無產階級解放萬歲」……²⁸等等，同時爲了加強農組的組織工作，通過了謝雪紅所提案的成立救援部支部、青年部支部和婦女部支部的建議，把台共建黨綱領落實到基層。

我們可看出，無論從指導路線的確立、組織工作的強化、職務的分配上，台灣農民組合在第二次全島大會的進行上，已完全被台灣共產黨所控制，而謝雪紅所領導的台灣共產黨之所以能順利掌握台灣農組，簡吉是其中的關鍵人物。其實爲了加強台共對農民組合的控制，在第二次全島大會開會前，台共東京特別支部的林木順指示林兌回到台灣，並把所擬定的「農民問題對策」交給謝雪紅，謝雪紅再把「農民問題對策」的重要指示轉達給簡吉，以便在全島大會上議決。就在此時的日本當局也已警覺台共的活動正藉著農民組合顯現出來了。

在這次大會中，簡吉展現了他不屈服的精神。大會是在日本警察的高度壓力下進行，在會議中每每被大叫中止，現場於是衝突叫罵聲不斷，簡吉盡力的控制會場，努力維持秩序，一旦情勢升高到非常危險時，他就宣布休息暫停，會議第一天終能勉強結束。可是第二天在討論議案時，與日警發生衝突，簡吉等人被檢束，由此可見當時情勢之嚴峻。而由於日本已警覺台共的介入農組，當局爲了破壞農組的活動，也藉以了解台共與農組的之間的關係，遂於1929年(昭和4年)2月12日，以假藉「違反出版法規」的名義，對全島農民組合機構進行逮捕。

這次的事件，使得多數農組領袖遭到日本當局的逮捕和監禁，農組會員因此銳減，可是對日本當

²⁷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農民運動〉，頁131-142。

²⁸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農民運動〉，頁144-149；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頁660。

局而言，其實也產生了某些程度的反效果，因為在此之後，農組的幹部與組合員的思想更趨近共產主義，更多農組人員加入台共，台共在農民組合的地位更加穩固了。²⁹簡吉就在這次事件當中被判刑，關了整整一年，可是他也沒有因此屈服，在入獄前的保釋期間，簡吉連同趙港，在台北開設了「農民組合台北出張所」，作為法庭鬥爭的據點及中央幹部的會合中心，並積極進行農組的重建，在台共監護下進行改造，改選臨時中央委員，推舉簡吉、趙港、楊春松、陳德興、張行等五人為中央常務委員，審議並通過了農組的新行動綱領。此後，活動轉變為非法的地下運動，專靠個別訪問或舉辦座談會來推動，致力於農村青年的赤化與組織的擴大。

1930年(昭和5年)對農組而言，是沉寂的一年，但他們仍默默的進行非法和祕密的活動。此時，世界經濟的恐慌逐漸影響，尤其是農村經濟受害最深；另一方面，在史達林控制下，所謂「資本主義第三期」的危機正在整個世界蔓延，促進了國際主義者的激化。這種局勢正好給正進行重組活動的農民組合一個推動農民運動的一個好契機。

在此前提下，1930年底，少數農組幹部依據台共黨中央的指示，祕密發表了一份「台灣農民組合當前任務」的文件資料，這文件對農民組合提出了某些批評，於是謀求確立農民組合的新方針與重組新陣營。其批評如下：

- (一) 對各種鬥爭不夠努力去加以激發、努力和指導。
- (二) 對中央的議決與指令，各同志理解不夠，以致未能貫徹。
- (三) 少數幹部的專制作風
- (四) 陣營內仍存有合法主義與組合主義的傾向。
- (五) 為徹底煽動「土地革命」。
- (六) 缺乏對楊連一派的積極鬥爭。
- (七) 缺乏針對青年與婦女的要求。³⁰

基於這樣的批判，農民組合幹部於1930年(昭和5年)11月20日、21日兩天，召開了「中央常任

²⁹李里，《日據台灣時期警察制度研究》，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7年，頁232。

³⁰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農民運動〉，頁218-221。

委員會」，會中決定把農民組合做爲台共指導下的大眾團體，而於 1931 年(昭和 6 年)1 月 1 日所召開的竹崎會議中通過中央常任委員會提出的「支持台灣共產黨」議案，且將之付諸實施。此時的農民組合已和台共完全在同一路線上了。從此以後台灣農民組合成爲了台共的外圍組織，這象徵著台灣農民組合已成爲一個非法、地下化的運動團體了。

1930 年(昭和 5 年)12 月 24 日簡吉出獄，隔年 1 月 1 日簡吉就接到要召開竹崎會議的通知。會議中，簡吉依「戰線配置案」前往北部聯合會，召集州支部聯合會及各支部委員舉行委員會議，傳達竹崎會議所決議的支持台灣共產黨各項重要決議及新組織方針與戰略戰術，並獲得承認。由於當時農組活動受到日方嚴格取締而難以施展，各地農組幹部相繼到本部向簡吉求助，簡吉不畏艱難，到處奔波，他協助支部重建，研擬行動方案。可惜因爲親密戰友趙港的被捕，許多計畫尚未發展即胎死腹中。

台共的發展，備受日本殖民政府的重視，所以 1931 年 3 月起，台灣總督府開始搜捕台共份子，反日運動也隨之劇烈，被捕受難的同志也越多，農組活動與竹崎會議的活動幾乎無法實行，台共、農組與文協均受到日本殖民政府的高度監控，爲了恢復組織運作，領導群眾，只能以另一種形式出現，再加上簡吉注意到正坐牢同志的家屬困境，以及剛出獄幹部的窮困潦倒，以簡吉爲首的「台灣赤色救援會」便孕育而生，「赤色救援會」可說是日據時代最後一波社會運動，簡吉也是戰到最後的一個領導者。但這也使得簡吉二度入獄，這次的罪名是召開了三次文協、農組聯合會議，成立台灣赤色救援會，³¹再加上他是台共中央委員，最終被判禁錮十年。

肆、結論

由於台灣農民組合的組成份子是個農與蔗農，其本身經濟條件與知識有限，簡吉做爲台灣農民組合的領導者，必須爲農組的未來謀求出路。在初期的抗爭有了進展以後，爲保有抗爭成果，必須尋求外力的支援與技術，所以簡吉到日本請願期間，拜會了當地的日本農民組合，不但獲得了同情，也取得了日本農民組合的公開支持，在日本農民組合的會議決議文中就指出：「台灣農民組合在孤立無

³¹蔡石山，《滄桑十年：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 1924-1934》，頁 203。

援中勇敢戰鬥，我日本農民組合需支援彼等，使得徹底的解放台灣之農民。」³²所以謝春木在《台灣人の要求》一書就曾指出：簡吉、趙港從日本歸來後的農民團體，鬥爭方式幾乎很多都是學自日本國內的農民團體的手法。³³雖然請願運動毫無進展，不過也與勞農黨取得戰略上的聯繫，就在日本農組與勞農黨的激勵與支援下，農民組合開始左傾，示威遊行活動變得較以往激烈，農組人數也從幾百人遽增至兩萬多人，是台灣農組的極盛時期。

台灣農民組合成為當時台灣最大也是組織最健全的社會運動團體，隨著謝雪紅的介入，她想重建日共台灣支部，第一個目標便是取得和台灣農組的合作，他極力遊說農組許多幹部入黨，尤其是簡吉在當時的農組最具影響力，是她爭取的第一目標。於是日本勞農黨在台灣農民組合的指導者角色，便逐漸被台灣共產黨所取代。

簡吉與謝雪紅的合作，確實帶給農民組合有了飛躍性的成長，支部組合擴展，另外增加了四個聯絡處，所以農組與台共結合後，確實使得農組在運動策略上更加活絡，足證台灣農組在採取了更左的路線之後，農民運動更受到農民的支持。

可是就在農組赤化的同時，台灣總督府開始進行殲滅性的鎮壓政策，利用「違反出版法規」的莫須有罪名，對台灣農組的全島機構進行突擊性的大檢舉，農民組合從此由盛轉衰。

所以有學者認為「當時農民組合的領導者，對於客觀情勢認識不足，錯估農民的鬥爭力量，妄信教條，過早轉向階級鬥爭」³⁴，或「農民組合忘記了本來任務，一頭栽進政治指導，忽略經濟鬥爭，切斷與民眾的紐帶，導致自己與民眾疏離」³⁵，但以當時的情勢來看，左翼思想乃當時世界之潮流，當一個反對運動無法突破其當時困境時，若有一些助力或學說，可以讓他們認為所奮鬥的目標是神聖且高尚的，那麼偏向也是必然的趨勢。

³² 《台灣民報》第 146 號，1927 年 2 月 27 日，頁 7。

³³ 謝春木，《台灣人の要求》，台北：台灣新民報社，1931 年，頁 37。

³⁴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台中市：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 年，頁 563。

³⁵ 蕭友山、徐瓊二著，陳平景譯，《台灣光復後的回顧與現狀》，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 年，頁 4-5。

參考文獻

專書

- 山邊健太郎編，《台灣》（現代史資料二十二），東京：みすず書房，1971年。
- 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6年。
- 王鳳雄，《日據時期台灣社會解放運動及論述》，私立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
- 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台北：草根文化出版社，1998年。
- 李里，《日據台灣時期警察制度研究》，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7年。
- 若林正丈，《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台北：播種者，2007年。
- 連溫卿著，張炎憲、翁佳音編校，《臺灣政治運動史》，台北縣板橋市：稻鄉，1998年。
- 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臺灣史觀》，台北：麥田出版，2011年。
-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台北：麥田出版，2009年。
- 陳逢源，《台灣經濟と農業問題》，台北：萬出版社，1944年。
- 黃師樵，《台灣共產黨祕史—台灣史上的第一面紅旗》，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年。
- 楊光華，《日據時期台灣農民組合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
-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台中市：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
- 蔡石山，《滄桑十年：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 1924-1934》，台北：遠流，2012年。
- 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年。
- 蕭友山、徐瓊二著，陳平景譯，《台灣光復後的回顧與現狀》，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年。
- 謝春木，《台灣人の要求》，台北：台灣新民報社，1931年。
- 謝雪紅，《我的半生記》，台北：楊翠華，1997年。
- 羅文國，《日本殖民政策與台灣農民運動的形成（1895~193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

期刊論文

- 江亮演，〈日據時代臺灣農民與勞工的社會運動〉，《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5期，1997年，頁127-140。
- 陳翠蓮，〈菁英與群眾：文協、農組與台灣農民運動之關係（1923-1929）〉，收錄於陳慈玉主編的《地方菁英與台灣農民運動》，2008年。
- 謝四海，〈二林蔗農事件的時代背景與對臺灣農運的影響〉，《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第107期，2010年，頁33-58。

報紙

《台灣大眾時報》(1928年)

《台灣民報》(1926年~1927年)